



創于1897

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

卢建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

卢建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卢建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729 - 5

I. ①现… II. ①卢… III. ①现代汉语—语言结构—研究 IV. ①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729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

卢建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729 - 5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39.00 元

序

卢建博士的著作《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即将出版,付梓之前她叫我写序,我欣然应允。作为她就读博士期间的导师,我对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卢建于2001年至2007年攻读东京大学博士课程(包括两年休学时间)。由于她成绩出色,考入博士的第二年即申请到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在学期间,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对学问精益求精。为取得写博士论文的第一手资料,她不惜于2004年至2006年休学两年,深入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各省进行方言调查。这种认真治学的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个留学生,能在六年(包括休学的两年)时间内就出色地完成博士论文,这在当时东京大学语言信息科学专业的博士生中是少有的。本书就是卢建当时提交给东大的博士论文。有关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的研究,以往已经有不少论文和相关的学术成果,但卢建还是知难而进,勇于探索,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创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把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本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和贡献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首次以双及物语义关系为轴心,将相关句式放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西北方言—普通话(北京话)—东南方言”历时和共时两大坐标上进行系统的考察,探寻双及物句法结

构的演变路径和轨迹。不仅明确指出了语言的接触和渗透给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的演变带来的影响,并且梳理了此结构内部不仅存在同一来源,同时还存在不同来源的句法特征。

2. 对在汉语平台上建构的大一统的与格接受者次第前移的“动+直+介_给+间→动+介_给+间+直→介_给+间+动+直”演变链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充分认识和肯定汉语自身演变的前提下,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由“单一变迁”演变而成的观点。主张汉语内部不同地域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均质的体系,语法的演变也并不是单纯在同质的语言内部发生的,而是通过语言间的接触、渗透和融合而实现的,并对其演变的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有效的论证。

3. 汉语拥有三千年以上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方言;周边还有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特别是唐朝以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接触日益频繁。本书通过历时和共时的考察和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汉语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对探寻汉语的演变轨迹极其有益的具体事例。

总而言之,本书视野开阔,理论扎实,行文流畅,分析到位。可以说是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另外,部分结论在推导过程中也还有牵强之处。不过,这些瑕疵并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参考和借鉴了不少日本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在中国鲜为人知或较少受到关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还起到了一个促进中日学术交流的作用,既能使中国学者看到日本的研究成果,又能让日本学者了解中国相

关研究的最新成果。我相信本书今后将成为一部在该领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杨凯荣

2016 年仲秋

目 录

第一章 先行研究和本论要旨	1
1.1 先行研究概述	1
1.2 本论的要旨及构成	3
第二章 授受意象的语言化及其折射的句法策略信息	8
2.1 引言	8
2.2 给予意象图式及其意象的语言化	9
2.3 索取意象图式及其意象的语言化	13
2.4 认知域向句法域的投射	17
2.5 地域和历史界面透析的句法表述策略信息	23
第三章 双及物句法结构式的句式沿革	28
3.1 先行研究及评述	28
3.2 殷商—先秦时期	36
3.3 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57
3.4 宋—清时期	89
3.5 小结	108
附：本章例句引用的主要古籍书目	110
第四章 东南方言的右分枝表述策略及其句式的历史层次	112

2 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

4.1 东南方言的右分枝表述策略	112
4.2 给予义双及物结构式的参差及其历史层次	115
4.3 具有地域普适性的索取句式	161
4.4 双及物结构式历史演变的共时再现	168

第五章 西北方言的左分枝表述策略和语言的地域感染

.....	172
5.1 引言	172
5.2 表述手法相对简约的西北方言	174
5.3 给予义双及物结构式在西北和东南方言中的生存 互补态势及亲缘性假想	193
5.4 西北方言给予义双及物结构式的类型学特征	231
5.5 西北方言中的索取句式	253
5.6 小结	255

第六章 处于东南和西北方言板块挤压中的普通话(北京话)

.....	257
6.1 引言	257
6.2 表现“中庸”的普通话(北京话)	262
6.3 地域夹角中的普通话(北京话)	324
6.4 北京话的类型学思考	336

第七章 双宾句式的语义内涵及其认知心理实验

7.1 双宾句的句法认定	341
7.2 双宾句式语义内涵的不对称性	348

7.3 句式语义的认知心理实验	353
7.4 双宾句的深层句式语义	369
第八章 结语	376
参考文献	387
后记	428

第一章 先行研究和本论要旨

1.1 先行研究概述

1.1.1 双及物结构式的共时研究

在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研究中,早期的共时研究大都是以形式为纲,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热点聚集于汉语的双宾句式。直至世纪之交,汉语的语法研究者才将研究视角转到以意义为纲,对表述双及物关系的双宾句式和与格句式等相关句式做全面的研究和统一的解释。《马氏文通》以来,学者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

a. 传统语法学从意义出发,界定了双宾句的语义内涵和范围,对其动词进行了分类,并归纳出双宾句式;(马建忠《马氏文通》、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杨树达《高等国文法》、赵元任《中国话文法》)

b. 双宾句的全面研究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下进行的。在对双宾句进行全面描写的基础上,对双宾动词进行了再分类,

^① 限于篇幅,对先辈和时贤的先行研究我们只做概述,具体的细节将根据本论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随文给出。

提取出双宾动词的语义特征,扩大了双宾句的范围,并探讨了双宾句的成句条件等;(宋玉柱,1981;朱德熙,1982;马庆株,1992;李临定,1984)

c. 生成语言学从结构生成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双宾句的论元结构和题元角色,并把研究的触角拓伸到双及物与格结构,探讨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之间的衍生关系;(汤廷池,1992;顾阳,1998;徐杰,1999;周长银,2000)

d. 配价语法和“格”语法的引入,使语义研究再度成为语法研究的宠儿。配价语法将双宾动词定义为三价动词,讨论了其配价问题,即宾语是动词的配价成分充当的,缩小了双宾句的范围。但在采取语义配价还是句法配价上存在着争议;(范晓,1986;张国宪、周国光,1998;朱晓亚,2001)

e. 在以往描写的基础上,认知语言学对双宾句进行了重新审视。以往研究“双宾语结构”多是从“形式(位置)”角度定义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使研究视点重新转向语义,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跟人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主客观合一”的语义观势必会比传统的语义学更关注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中介——认知构建(cognitive construction)层次的作用,现实世界通过这个认知中介层的过滤,并不能与语言完全对应。因此,面对相同的客观事物或情景,由于识解(construal)方式的差异而会形成不同的“意象”(image),从而选择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就本论而言,认知语法把“双宾语结构”视为表述双及物语义关系的形式成员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成员,把双宾构造纳入到汉语的双及物句法系统之中做统一的描写和解释。尤其是句式语义的提出,聚现了“双及物句法结构式”

间的横向联系以及语义与结构式之间的映射关联,是功能语法的“交际动因影响语法结构”思想的汉语实践。(古川裕,1997;张伯江,1999;沈家煊,1999;刘丹青,2001;张国宪,2001、2002)

1.1.2 双及物结构式的历史研究

在以上学者们注重运用新的理论对这一古老而存争议的重要语法现象进行研究的同时,对其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考察也一直没有间断。(周迟明,1964;贝罗贝,1986;徐丹,1990)尤其是语法化理论兴起以后,学者们更加注重对双及物结构式的古今发展脉络的追踪,并用方言来加以证明,以探寻其语法化路径。(张国宪,2002)

1.2 本论的要旨及构成

先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为本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由于学术背景和历史的掣肘,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双宾句式的构成和性质认定方面。本论拟以双及物语义关系为纲,将相关的句式放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西北方言—普通话(北京话)—东南方言这一历时和共时的两大坐标上来进行系统的考察,探寻双及物句法结构式的演变轨迹和动因,在语言类型的大背景下建构现代汉语双及物语义和语法范畴。

双及物结构指的是一种论元结构,即双及物动词带主体、客体和与事三个论元成分的结构,其语义特点是客体和与事均与谓语动词发生及物关系。在语义角色的指派上,主体是授受交易事件的施动者,客体是事件的交易物,而与事则是事件的受益者或受损

者(夺事)。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受益者是一个宽泛的语义角色概念,既可以是接受者,也可以是服务对象,本论双及物结构式中的与事囿于给予事件的接受者和索取事件的受损者(夺事),其事件属于事理上的“行域”范畴,^①而将服务对象参与的事件表述结构视为是单及物结构。根据跨语言的语法研究报告,双及物语义结构是存在于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但其句法表现形式(即“双及物句法结构式”)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主要有两大类:1)与格单宾句式。这种句法指派具有类型学的普遍性;2)与格双宾句式。它只能在部分语言中得以实现,并非人类语言的共性。(刘丹青,2001;张国宪,2001、2002)

根据以往的研究,现代汉语双及物句法结构式主要有6种。

① 汉语学界在讨论双宾句时,常常会涉及一种所谓的表述“言域”事件的“教示”类句法结构,如“括母问奢其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张三问李四一个问题”等。从历史语料看,这种结构式自汉代发生了从“动+直+于+间”“动+间+以+直”向“动+间+直”的结构转换以后,基本结构形式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参看第三章)在共时平面上,虽然目前多数方言都以采用“动+间+直”形式为主,但也存在着部分的方言差异。比如在某些东南方言中,同时还存在着“动+直+(介)+间”的形式。以广东阳江方言为例,在其方言中就存在着“我教呢本事你”“问句话事你”的说法,类似情况也存在于泰和等鄂东方言中。(参看黄伯荣主编,1996;李如龙、张双庆,1997)此外,“教”和“问”分别出现的句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温州话中,“教”存在着“动+间+直”“动+直+间”两种双宾形式,而“问”似乎只有“动+间+直”一种。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以兰州话为代表的西北方言中。在这些方言中,“教”以采取“给+间+动(·给)+直”为主,而“问”却可以出现在双宾句中。(参看第五章)粗浅来看,共时平面上“教”和“问”所表现出的结构式的差异与“给予”和“索取”义双及物结构式之间的差异有着某种平行关系,因此考察“言域”事件的“教示”类句法结构式的发生、演变和发展对于我们研究表述“行域”事件的“给予”和“索取”义双及物结构式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限于我们的研究精力和研究主旨,本论除在第三章考察结构式的历史状况时将有所涉及之外,其他章节将不做过多的讨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笔者在本论完成之后拟将研究触角延伸到“教示”类结构,重点考察它与“给予”“索取”义结构式的纠葛。

就现代汉语普通话双及物句法结构式的生存现状来看,它的最大变化是存在于古代汉语和南方方言中的“动+直+间”(如:我送一本书他)这一双宾句法结构式的消失,表现出区别于南方方言的对立性特征;如果以与事成分的句法位置为视点,现代汉语共时平面存在着东南型“动+直+介+间”(我送一本书拨他)和西北型“介+间+动+直”(我给他送一本书)的对立:即西北方言倾向于把与事成分介宾状语化,而东南方言则更喜欢将与事成分介宾补语化。普通话(北京话)正处于东南和西北这一对立的交锋口,在双及物句法结构式的整体格局上表现出与左邻右舍的相关性和独特性。

从语序类型学角度来看,汉语从历史上就表现为不典型的SVO类型。介词短语前置于是打破其语序和谐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对,介词短语后置结构的存在被看作南方方言比北方话更接近SVO类型的证据。普通话(北京话)与东南和西北方言在给予义双及物句法结构式上的对立,也与“主语+把+直宾+V+给+间宾”(我把这本书送给他)在方言间的不同表现具有平行性,是其语序类型差异的集中体现,具有类型学的价值。

假如以历史演变为视角,从先秦直到现代,汉语语序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据孙朝奋(Sun, Chaofen, 1996),汉语两千年来语序稳定的唯一重要例外就是前置词短语由动词后向动词前的发展。正是这一变迁,对汉语语序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Li and Thompson(1981)、黄宣范(Huang, 1982)、Peyraube(1994)、孙朝奋(Sun, Chaofen, 1996)以及张赅(2002)等分别从结构变化、语法化、介词兴替、语义关系等汉语内部和语言接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其历史性前移的事实和原因;同时刘丹青(2003)又从语序类型学角度考察后发现,正是这一语序变迁导致汉语背离了其类型共性,

并认为目前的研究对其原因还没有找到圆满的解释。纵览先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其立论的基本前提是倾向于将汉语视为一个同质的系统,试图在这种同质的构想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汉语发展和演变体系。毋庸赘言,这种立论的直接后果是对语言间的接触、渗透和融合,以至语族间的互动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研究视野的局限,这种汉语发展和演变体系的构拟基础基本囿于北方地域(不包括西北),至多零星涉及东南方言。假如考虑到西北方言的语言状况,一些结论就难免捉襟见肘。(具体细节参看第五章之5.3.2.3)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一方面将力图拓展研究视野,把西北方言纳入考察范围,构筑一个囊括西北方言、普通话(北京话)和东南方言的大汉语平台,分别描述各自地域的双及物结构式的生存现状和环境,建构西北方言、普通话(北京话)和东南方言在双及物句法结构式上的语法化链,借此作为观察问题和寻求答案的窗口,尝试从共时和历时角度揭示并给出现代汉语双及物句法结构式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在充分描写西北方言、普通话(北京话)和东南方言等不同地域双及物结构式的基础上,注意结构式中的“自源”和“异源”成分的剥离,从汉语的自身演变和语言影响、渗透两个视角探寻汉语双及物句法结构式的演变轨迹和动因。限于篇幅和前贤的研究侧重,在研究路向上我们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研究时效观,在充分认识和肯定语言自身演变的前提下,重点关注语言的接触和渗透对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的形成、演变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与前贤的研究成果形成互补,以全面地反映和揭示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的演变诱因,窥视人类语言演变的共性。

理论上,本论信奉功能主义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结构是人们为了实现信息交流的目的而自我调适的结果,因此,句法结构的任何

变异本质上都导源于语义。不过,语义也不完全是一种真值语义,与人的认知心理密切相关,是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统一体。语言作为语言学者的研究对象,其建立的范畴都是“典型范畴”,具有非离散性,所以我们不把语言规律的绝对性作为研究的唯一追求目标。

方法上,本论坚持归纳与演绎并举、描写与解释并重。归纳力争详尽,演绎以期合理;描写力图客观,解释以求充分。

第二章 授受意象的语言化及其 折射的句法策略信息

2.1 引言

按照认知语法的语言观,语言结构尤其是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认识客观世界而在头脑中形成的概念结构的模型,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或“象似”(iconicity)关系。授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交易行为,表现出方向相反的给予和索取两种不同的情景。给予和索取作为客观世界的物象,在人的感知世界(认识)中聚现为两种迥异的“意象”(image)。“意象”是一个心理上的“完形”(gestalt),是一个被感知的整体,不同的“意象”表征对语言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句法形式角度看,人类语言的双及物式无论在跨语言的范围内还是在单个语言内部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与事(即接受者)或夺事(即受损者)的语法地位和句法标记上。在有形态标记的语言中,它既有可能带宾格标记,又有可能带与格标记。就汉语而言,它在线性序列中,既有可能紧接动词之后,充当所谓的间接宾语,也可以充当与格介词“给”的宾语,表现出不同的时代或地域特征,透析着授受语义表述的句法策略信息。